

新媒體融合時代高校社科學報何去何從

——兼論高校社科學報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幾個問題

李宏弢

【提 要】 新媒體融合發展時代高校社科學報的優勢不復存在，其生存空間亦受到了威脅，因此其何去何從已經成為時代課題。行政主導改革中的高校社科學報處於困頓前行狀態，一方面體制的溫床讓高校社科學報得以逆勢發展，另一方面制度的羈絆又使其發展已經到了末路。新媒體的衝擊使改革勢在必行。專業化和集約化的探索為高校社科學報改革注入活力，轉變計劃體制下的固有思維，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是其走出困境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 高校社科學報 新媒體 期刊改革 融合發展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1 - 0120 - 11

一、困頓前行：行政主導改革中的高校社科學報的現狀

自 1906 年我國第一份大學學報《學桴》創辦以來，大學學報已經發展至 2,500 餘種，而人文社科類大致有 1,700 多種。如此眾多的高校社科學報，其效益和產出並不能等量齊觀。隨之而來的，是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其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更讓本已飽受詬病的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社科學報陷入更加尷尬境地：辦刊思維老套、辦刊體制僵化、創新意識不足、全散小弱無法形成發展合力等等。以至於進入 21 世紀以來，有關高校社科學報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相關管理部門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出台相關文件以改變高校社科學報現狀。

較有代表性的是《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教社政（2002）10 號），該意見是進入新時期以來全面提升高校社科學報的統領性文件。隨後，2003 年《教育部關於進一步發展繁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若干意見》（教社政（2003）1 號）又發佈實施，其中第 8 條明確提出“加強高校文科學報建設，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大刊工程，重點建設一批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期刊”。^①基於以上兩個文件，2003 年底，教育部正式啟動“名刊工程”建設，並下發了《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實施方案》（教社政（2003）12 號），其總體目標是“通過國家（包括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和主辦單位）的支持

和學報的改革，在五年時間內滾動推出 20 家左右能反映我國高校學術水平和學科特點、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社科學報及其特色欄目。其中，培育出 5～10 種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社科學報。逐步改變目前高校社科學報‘全、散、小、弱’的狀況，實現‘專、特、大、強’的目標”。^②

2004 年 2 月教育部召開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首批入選學報建設座談會，會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袁貴仁發表重要講話，隨後，教育部下發了《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首批入選學報建設座談會會議紀要》（教社政廳〔2004〕1 號），根據該文件，“教育部啟動的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是國家重點支持的、為進一步加強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展示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項重大工程”。^③其目的是通過名刊工程的示範效應，集中打造一批特色鮮明、高水平的具有良好社會效益的學術期刊，並進而形成帶動效應，促進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整體上水平，引領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與繁榮。目前共有三批 31 家高校社科期刊入選名刊工程，其中絕大部分是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可以說，名刊工程實施至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入選名刊工程的各期刊，緊緊圍繞“名刊工程”的建設目標，緊跟時代步伐，刊發重大理論和學術熱點文章；整合學術資源，開設特色欄目，約請學術名家擔任欄目主持人，開設學術專題研討；有的名刊之間聯合組稿，共同策劃選題；帶動學術研究的縱深發展，培育學術流派；等等。以名刊工程為輻射，帶動了高校社科學術期刊，通過建設特色欄目進而尋求期刊特色發展之路。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進入名刊工程建設的期刊畢竟只是少數，相較於 1,700 多家高校社科學報而言，能夠真正辦出特色的並不多，標籤效應不明顯，高校社科學報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得以解決，“全、散、小、弱”的狀況依然存在。名刊工程的實施，雖然“名刊學報的內在質量（主要體現在所發表論文質量）有了很大提升，但這並不等於名刊學報已經歷了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的過程。對照‘專、特、大、強’的目標，在學報體制、協同合作、數字化傳播和社會評價四方面，尚未有突破性的進展，制約名刊學報發展為一流期刊的瓶頸依然存在。需要說明的是，未能突破瓶頸，固然有名刊學報主觀因素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名刊學報不努力，而是突破的條件尚不成熟”。^④

2011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中辦發〔2011〕19 號）針對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數量過多、規模過小、資源分散、結構不合理、市場競爭力弱等突出問題指出，是現行體制制約了報刊出版業的發展，提出了轉制的治理思路，實行嚴格的報刊出版市場准入制，引進退出機制，整合出版資源，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形成一批專、精、特、新的現代報刊出版企業。可以說，這一改革的意見其初衷是好的，意在改變當前我國非時政類報刊的現狀，實現非時政類報刊集約發展，形成規模效應。但是，該意見還存在著較濃重的行政指導性，相關行政指導非但沒有弱化反而增強，這並不利於非時政類報刊轉制改革和集約發展要求，而且對於非時政類報刊中大量的學術期刊編輯部，沒有給出改制意見，而是“另行制定具體改革辦法”。

2012 年 7 月 30 日，這一“另行制定具體改革辦法”出台，即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佈的《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其中，關於“科技期刊和學術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直接把這些學術期刊編輯部推向了企業，給出的改革路徑竟然是“併入新聞出版傳媒企業”。^⑤一時間，在學術界和期刊界嘩聲不斷，批評和反對聲此起彼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該實施辦法略顯草率，存在概念混淆、沒有充分考慮學術期刊的特殊傳播途徑和自身的特點等因素，

一刀切地將學術期刊轉企，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學術期刊的根本問題。這一實施辦法因為來自學術界及期刊界的強烈反對而擱淺。

2014年4月3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佈了《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新廣出發〔2014〕46號）。該通知同樣指出了當前我國學術期刊存在的結構不合理、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低、整體質量不高、學術期刊功能異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違規經營等方面的問題。^⑥可見從2004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實施以來的十年間，學術期刊存在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對此，期刊行政管理部門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所提出的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的這一通知，更具有了時代緊迫性。該通知從三個方面對規範學術期刊進行把握，分別是：嚴格學術期刊出版資質和要求，建立完善學術期刊出版准入制度；完善扶持激勵政策和保障體系，構建學術期刊發展長效機制；落實責任，強化管理，切實推動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其中，在其第二部分中關於積極推動學術期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項中指出：“通過深化改革、調整結構、整合資源，創新體制機制，增強學術期刊發展能力。逐步推進學術期刊編輯部體制改革，探索建立學術期刊編輯部分散組稿審稿、出版企業統一出版發行的運營模式。依託優質學術資源或優勢出版平台，組建具有學術品牌影響力和綜合發展實力的學術出版集團，構建國家重點學術期刊數字化平台，引導學術期刊集約化發展和數字化轉型。鼓勵專業性強、辦刊特色突出的學術期刊，走‘專、精、特、新’的發展路徑，支持其差異化發展。”^⑦儘管我們看到這裡並未重申2012年《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的一刀切轉企，但是其關於編輯與出版相分離的思想卻延續了下來。

針對這一通知，隨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開展了學術期刊認定工作，首批確認5756種學術期刊，2016年開展了第二批學術期刊認定工作，又有693種被確認為學術期刊。^⑧這一認定是從出版資質角度，對於那些不符合學術出版規範，超範圍經營，違規經營的期刊進行取締的行為，客觀上規範了哪些屬於學術期刊。但更進一步的，該通知的相關項設置並未落實到位，如“對出版質量高、學術影響力強的學術期刊予以政策扶持”上，雖然設置了“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百強報刊”、“科技期刊影響力提升計劃”等，但因為這些獎項並非針對學術期刊，故而提升學術期刊整體質量的效果並不顯著，學術期刊存在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值得一提的是，此間為了扶持和推介精品學術期刊，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於2012年開展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術期刊資助項目，先後兩批共200家社科學術期刊獲得這一資助，這一項目資助對於學術期刊提升學術品質、實現數字化轉型、加強國際合作等方面效果顯著。在推動中國學術期刊品牌建設，形成精品學術期刊群，提升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可見，進入21世紀以來，由我國行政主管部門所主導的學術期刊改革一直沒有間斷過，但事實上其效果並不盡如意。另一方面，由於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數字化的飛速發展，大數據的廣泛應用，新媒體的異軍突起，其快捷的傳播方式更凸顯出傳統學術期刊在體制上的落後及與時代發展的不和諧。面對嚴峻的形勢，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社科學報，出現了內部的分化發展，一部分是積極主張改革並已經開始嘗試探索新的經營模式，一部分持觀望態度，還有一部分則對改革不管不問，依然重複著原有辦刊模式一成不變。從現實的發展來看，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越是辦得好的期刊，越關注國家的改革發展動向，越是積極開展學術期刊經營模式的探索以及生存方式的改革，反而是生存空間比較有限的期刊，還躺在體制的溫床上睡大覺。比如“中國高校

系列專業期刊”就是由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期刊發起的，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為依託，進行電子雜誌出版工作，開啟了綜合紙質刊向專業網刊發展的嘗試。在移動媒體迅速發展之初，又是這些期刊聯合超星數字出版集團共同組建了“全國高校社科期刊創新聯盟”，借助超星移動平台，開始“域出版”嘗試。這也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考問題的維度，也就是說，由行政主管部門主導的學術期刊改革頂層設計至今難以見成效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這是一個來自學術期刊外部的推動力量，而要真正達成改革的目標，必須要從學術期刊內部着手，也就是說喚醒學術期刊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省，而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矛盾主體：體制的溫床與制度的羈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大學進入發展時期，據資料顯示，1949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05所。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大學教育突飛猛進。1978年，高等學校達到了598所。到了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國大學教育迎來了發展合併、擴招的熱潮。到2003年，全國高校已經達到1,600多所。相應的，中國大學學報在數量上也迅速擴張。從1977年恢復高考前的150多家，到目前為止的1,700多家，基本上是“一校一綜合刊”，且其辦刊宗旨大部分以刊發本校教師學術文章為主，使得高校學報自產自銷，成為學校學術生產的自留地。儘管當前一些學術期刊在開放辦刊的指引下，刊發本校教師學術文章的比例有所下降，有的期刊規定刊發本校教師文章不得超過總發文的20%。這一舉措無疑會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但從總體上，學術期刊為本校教學科研、學科發展服務的性質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這種從建國初期按照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的設計而確定的高校學報學術期刊體制一直延續到現在。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作為中國學術期刊的主管行政部門積極倡導學術期刊走開放式、國際化辦刊道路，力爭打造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話語體系和增強國際學術影響力；而另一方面，作為高校學術建設的窗口的高校學報，其依託的主體——高校——又難舍其自身利益需求。正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這些學校還固守著傳統的思想，即高校學報應該為本校教師刊發學術文章，促進本校學科發展。我們說，高校學報，為本校服務這一宗旨並沒有錯，但隨著現代化大學的建設發展，以及時代發展的需求，如果還固守著這種傳統觀念，那麼無疑，對於高校學報來說，這將是一個自我毀滅的過程。

自1978年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諸多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再到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發展歷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至今，人們的觀念從最初的排斥觀望，到有條件接受，到現在認為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的轉變。相較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則相對緩慢。從1978年的撥亂反正，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儘管此間也曾提到建設文化市場、發展文化產業等有關文化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但實踐中，改革力度並不明顯。而黨的十六大文件，第一次同時使用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概念，強調了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可以說加快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步伐。我們注意到，該文件將文化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也向我們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文化發展是有區分的。將文化區分為事業和產業兩個方面，這就意味著文化有經營性的和公益性的之分，有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和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區分。這一劃分將決定了高校社科學報在改革中，是將其納入文化事業性質還是納入文化產業性質；是應納入經營性的範

圍，還是公益性的範圍；是屬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範圍，還是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範圍。之後的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的出台，則標誌著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從時間節點上來看，我國的文化體制改革步伐要比經濟體制改革起步晚、進展慢。

我們再來看中國的學術期刊，其管理體制一直延續著建國以來的計劃經濟的體制，而高校社科學報更是延續了這一管理體制經年未變。這主要受制於其所依託的高校多年來一直是我國行政管理體系當中的事業單位體制的性質。我國事業單位體制比照行政機關體制進行管理。比如高校的主要領導由其上級主管部門負責選拔任命。高校內部也比照行政機關設置行政管理機構。儘管近年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一直被強調，但並沒有實質性進展。高校學報作為由高校主辦的學術期刊，在其管理體制上，大部分高校還比照學校內設的行政機關單位進行管理。有的學報主編有行政級別，比如處級、科級，有的甚至還是副校級。有的是獨立編輯部，有的是幾個編輯部聯合組成編輯部、中心，有的掛在學院、科研處、出版社等等，管理比較混亂，其建制基本由各個學校自主決定。在編輯人員的績效考核和分配上，也是比照行政人員的行政獎金進行發放。相較於學校內設行政機關的行政幹部，學術期刊的主編及編輯其工作性質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學術性，而把他們等同於學校內設的行政管理機構的行政幹部來對待並進行管理，不利於學術期刊的學術發展和生態建設。學報編輯的工作性質，更類似於科研工作人員。《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教社政〔2002〕10號）明確指出“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是高等學校主辦的、刊登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論文的、高層次學術理論刊物，是高等學校教學科研工作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社科學報編輯部是校屬院（系）一級的學術機構”，“學報編輯人員是學校教學科研隊伍的一部分，應列入教學科研編制，享受與教學科研人員同等的待遇”，“對於長期從事學報編輯工作，愛崗敬業，為辦刊做出突出貢獻的主編、副主編或骨幹編輯，應納入學校學術帶頭人或學術骨幹隊伍的建設計劃，為其提供從事科研的條件和給予必要的獎勵。”^⑩各個高校在貫徹落實這一工作意見時，也並不是完全按照此意見來執行。這就導致了高校學報的發展受管理制度的制約，很難發揮其活力。

現實中，將高校學報納入學校的行政管理體系，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相較於將學報作為教輔單位，一些學報更願意將自己納入學校的行政管理部門。而這些學報的主編們既是業務幹部又可以有行政級別，客觀上提高了學報在學校的地位。有的主編認為有了行政級別在對外交流中“比較好看”。這使得部分高校學報發展形成了路徑依賴，希望維持現狀而不願意改變。這也是當前學術期刊體制改革難以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共和國期刊60年的發展，體制一以貫之，不變也沒變。’這種制度慣性表現為：多數大學習慣於將學報作為自己的學術自留地，自己投資，解決自己學校教師職工發表論文的燃眉之急；多數編輯部習慣於做行政的附庸，財政上吃大鍋飯，稿源上等米下鍋；多數編輯習慣於做編輯匠，校校文字，改改標點，無關學術。在某種程度上，大學、編輯部和編輯本人，都既是傳統大學學報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傳統大學學報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與大學學報制度的‘自我強化機制’結合，使得我們一旦選擇了目前的這種學報制度，無論它是否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是否有利於學術發展，都很難自動地從這種制度中擺脫出來。”^⑪在體制溫床的滋生下，部分高校學報安於現狀，不希望改變也不願意改變。

就高校社科學報而言，其當初的設立，主要是因應了綜合性大學學科相對齊全的結果。一方面，在平衡學校內部學科發展建設上，儘管各高校在學科建設上有所側重，但如果在只有一本學

術期刊的情況下，這個學術資源分配給哪一個學科都對其他學科的建設有所偏頗。因而從學校利益的角度出發，是不會主動把高校學報辦成一本專業刊的。另一方面，針對總署提出的報刊體制改革中的退出機制，如那些規模比較小難以形成較大社會影響的學術期刊，如果讓學校把這一資源拱手相讓給有條件的出版集團來經營，從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學校也是不會同意這樣做的。於是，在這種個體及局部利益驅動下，高校學報改革便成為了報刊體制改革中的難題。

三、愛恨難捨：學術評價的制約抑或推動

在學術期刊發展中，我們無法迴避的一個話題即是學術評價。提起它，學術期刊的愛恨情仇真是難以言說。真是想說愛它不容易，想說恨它又很難。

當前，存在於我國學術期刊中的學術評價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以數據為基礎的，如 CSSCI 引文索引來源刊、北大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武漢大學評價中心核心期刊等評價體系。一類是以二次文獻為基礎的轉載機構如《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等的學術轉載評價指標。儘管兩類指標體系評價側重的標準不同，但均受到了學術期刊的重視。

在學術期刊評價中，“影響因子指標”是最重要的考量目標。“影響因子指標是一個最初源自西方自然科學評價的‘舶來品’，其對期刊影響力的評價準確度首先取決於引文的規範性，其次是對於評價的環境有著較高的要求，如期刊學科的準確劃分、時間長度上對偶然因素的彌補等等，而學科劃分的準確性尤其重要。在期刊評價實踐中，只要能準確把握其特性，影響因子的確不失為一個從特定角度揭示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具有較高顯示度的量化指標。”^⑩目前除了四大核心期刊，如中國知網、龍源期刊網等，也每年發佈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也連年發佈“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行榜。在這些學術評價體系當中，CSSCI 引文索引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評價體系。在 CSSCI 引文索引來源刊上刊發文章已經被各高校、科研院所考核職稱晉級、基金項目申報與結題、博士畢業等等的重要指標，有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還把 CSSCI 來源刊劃分為不同的等級進行量化考核。因此，當 2017～2018 年度 CSSCI 引文索引來源刊目錄公示的時候，在高校社科綜合性期刊界及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於是，聲討其有之，為其辯解亦有之。較為典型的如仲偉民教授和桑海博士共同撰寫的《如何客觀評價 CSSCI》一文，該文之主要觀點先是在《清華大學學報》微信公眾平台“獨立精神”上發佈，其後經修訂在《澳門理工學報》2017 年第 3 期上以專題筆談予以發表。文章呼籲期刊界理性看待和評價 CSSCI，指出“CSSCI 只是一個引文數據庫，將其視為學術期刊核心期刊目錄排行榜評價工具，是外界的誤讀和異化”。^⑪同期刊發的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沈固朝教授的文章《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 CSSCI》一文也呼籲“全面和正確地看待期刊評價工具”，“要看到評價工具的有利一面，也要看到不足一面，在使用過程中要注重它的問題，要看到引用的不同動機及其複雜性所造成的‘引文率’被扭曲的問題”，“要客觀地評價引文索引的作用，既不誇大，也不貶低”，並指出，引文索引的本質是檢索工具。^⑫這兩篇文章都着重強調把 CSSCI 看作是引文檢索工具，而淡化其在實際運用中的評價功能。儘管在現實的學術評價體系中，CSSCI 承擔了學術評價的功能，但從 CSSCI 自身建設初衷來看，它只是提供了引文數據分析，僅為數據服務平台提供個刊的引文數據排名而已。那該目錄的變化為什麼會引起如此之多的關注，又是什麼把其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我們同樣還要從其所提供服

務的性質上來考察。如果單純地從提供數據分析的角度來判斷，當前國內學術期刊數據庫平台如中國知網等所進行的數據分析並不輸於 CSSCI 引文數據庫，就讀者及用戶的使用習慣而言，可能中國知網更方便、快捷，所提供的相關數據更一目了然。但中國知網受重視的程度顯然沒有 CSSCI 引文來源期刊這麼強。究其原因，還在於 CSSCI 已經被高校及科研院所所採納和接受，並作為教師和科研人員相關學術利益認定的載體，這本身既兼具了學術評價的功能。所以，無論來自 CSSCI 官方所做的該引文數據工具的性質強調，還是那些呼籲客觀看待 CSSCI 的文章，都無法改變和弱化 CSSCI 在實際中已經承擔的學術評價功能。

說到此，就不得不提學術評價。其實，學術評價應該是立體的，多維度的，全方位的。那為什麼發展至今成為了單一的以學術期刊評價代替了更為全面的學術評價。沈固朝教授給出的原因是：“第一，學術期刊是承載學術成果的載體，對載體的評價和對內容的評價很難割裂開來；第二，科學家認為在一定的時期內一篇文章的重要程度可以通過被引用的程度來衡量。畢竟，引用反映了學術共同體對某一學術成果的關注和重視，通過對引文的分析，可以瞭解該研究對其他研究的影響，揭示相關學科之間、相關研究成果之間的關係，這是研究成果學術價值的體現；第三，依據文獻計量學原理編制的年度性的‘期刊引用報告’為科學管理機構進行學術資源的分配、學術活動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使得複雜的學術評價變得具有可操作性；第四，量化的引文分析結果與用其他方法評定的結果有極強的相關性；第五，由於學術評價是與學術機構整體利益和學者的個人利益掛鉤的，這種評價的競爭性，以及由於管理所要求的即時性等特點，使其在掌握公平性和易操作性方面具有相當的難度，以計量為主的期刊評價工具則具有相對優勢。”^⑩

可見，這種把 CSSCI 對學術期刊的量化評價等同於學術評價的做法，實際是高校和相關科研單位應對相對複雜的學術評價所作出的一種下策選擇。可以說，CSSCI 真是“躺著中槍”了。但這也印證了一個情況，那就是在眾多的所謂學術評價體系當中，CSSCI 之所以能夠獲得認可，並被廣泛接受，說明它的設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並兼具科學性，在沒有更好的能夠替代的學術評價出現之前，CSSCI 能夠承擔起這種學術評價擔當，在量化時代的學術評價上具有相對高的公正性。

當然，還有部分學者援引國外的同行評議機制來改革我國當下學術評價中的量化評價指標體系。我們說，同行評議應該是學術評價的理想模式，正如現在大家抨擊量化考評提出的代表作制考核一樣，這裡同樣存在著條件是否成熟的問題。而其根源同樣來源於當前學術期刊生存的體制問題。也即是說，體制問題是學術期刊發展的瓶頸問題，如果體制的問題解決了，那麼其他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在當前的學術評價體制下，有人說學術期刊已經喪失了其發展的自主權，學界被影響因子所綁架，學術期刊被量化考評牽著鼻子走，不利於學術生態的良性發展，等等。這些聲音固然代表著那些對期刊評價持反對態度的意見，但如果我們變換一下思考問題的角度，這些所謂的核心期刊和二次文獻的存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學術期刊為了保持自己的“學術地位”而不斷轉變辦刊思路、關注學術熱點問題、進行學術前沿探討、吸引學術名家青年才俊撰寫相關文章、深刻挖掘內涵建設、積極拓展數字傳播途徑、等等。無論是學術期刊為了迎合學術評價而進行的被動的改革，還是學術期刊主動出擊不斷向更高的目標邁進，對學術期刊的發展都是一種推動作用。這可以從 CSSCI 引文索引來源刊等入選期刊排名情況得以印證。還以高校綜合性學報為例，CSSCI 引文索引來源期刊只收錄 70 種高校綜合性學報，2017—2018 版又細分為高校綜合學報和高校社科學報。實際收錄高校綜合學報 58 家，高校社科學報 12 家。在收錄的綜合性學報名錄中，我們看到教育

部名刊工程建設期刊基本在列，部分還是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這也說明，只有注重期刊自身的建設，這也是期刊發展的根本，才能坦然面對各種評價。

四、切膚之痛：專業化之路何以可能

早在啟動名刊工程建設之時，教育部下發的實施方案中即指出要推出 20 家左右有特點的社科學報及其特色欄目，實現社科學報專、特、大、強的目標。可見，專業化和特色化是教育部提出的高校社科學報改革方向與路徑。袁貴仁部長對高校學術期刊走特色化的發展道路，提出了三個層次的建設。一是辦高校社科學報專業專刊，走學報整合之路。二是若干高校社科學報合作，走學報聯合之路。三是建設專題欄目，走專題化的發展之路。^⑤

2009 年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指出，進一步深化高校期刊出版單位改革，鼓勵高校期刊向專業化、特色化、品牌化、集約化、規模化方向發展。^⑥2014 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也提出“鼓勵專業性強、辦刊特色突出的學術期刊，走‘專、精、特、新’的發展路徑，支持其差異化發展”的推動學術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思路。可見在推動學術期刊改革的行政層面設計，都把專業化建設作為改革發展的重點。對此，位於制度底層的高校綜合性學報等學術期刊進行了積極的回應。

2010 年，同為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的《南京大學學報》執行主編朱劍教授和《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仲偉民教授，共同發起了高校綜合刊專業化改革的動議。他們因為對當前學術期刊的體制以及對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的憂思而走到了一起。兩人同是有感於教育部名刊工程實施的幾年間，目的和效果並不統一，名刊工程的實施是為了改變高校社科學報“目前總體上還處於全、散、小、弱狀態”，實現高校社科學報“專、特、大、強”的目標。但實施過程中，效果並不理想。於是便有了改變這一現狀，促進高校綜合刊專業化改革的創辦專業網刊的動議。^⑦

2011 年 2 月，“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以中國知網為依託與讀者見面。^⑧“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通過組建聯合編輯部，整合名刊優勢，在綜合性期刊專業化轉型上進行大膽嘗試。此間的 2011 年 7 月，新聞出版總署啟動了報刊體制改革，一年後，總署又出台了《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具體對報刊尤其是高校學報改革方面規劃了路線圖。儘管這一辦法在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擱淺，但是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的改革卻是我們不能避而不談的問題。

網刊創辦之初，來自期刊界不同的聲音並不少。其實，以當時的狀況，儘管我們知道學術期刊的改革遲早是要來的，但還不至於到了馬上、立刻、刻不容緩的地步。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是體制的產物，如果體制不變，我們的日子並不會壞到谷底。尤其是像兩位主要發起人所在的期刊，並不涉及辦不下去的問題。所以，他們完全沒必要去觸動這個冰山，去當那個吃螃蟹的人。但兩位主編卻是以他們敏銳的觸覺，或者說，是作為期刊人不願意自甘被社會拋棄而自謀出路。更進一步可以說，就是為了心中的那份追求，理想也好，責任也罷，就是不希望在未來，學術期刊只能出現在歷史裡。說得悲壯些，他們這算是“自掘墳墓”。用原《新華文摘》總編輯張耀銘的話講“寄託了學報人的人文情懷和對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渴望”。^⑨

從 2010 年聯合創辦數字化專業期刊的動議開始，到 2011 年初 17 家刊齊聚清華通過綜合刊專業化轉型方案，再到 2011 年 2 月 10 本專業網刊的出版，雖然這只是對原發綜合刊按照學科的分類進行的整合，但在當時，可以說讓人有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因為我們習慣了紙本的期刊，而專業網刊則是通過網絡出版，把綜合性期刊整合成專業期刊，在線出版，這確實是滿足了讀者的

專業需求。

專業網刊的探索，有其特殊的時代訴求。經過幾年的探索，網刊進入了平穩期。從最初的只有十幾家到現在的百餘家期刊加盟，從之前的 10 種專業刊到後來的 12 種專業刊和 7 種專題刊，從最初的繁瑣的網上推送到後期的方便、快捷的操作，網刊一步步在向前邁進。網刊的發展不但傾注了學術編輯的辛苦，更是學術期刊人積極進行學術期刊轉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和嘗試。但一般來講，事物發展至平穩期，也是容易滋生問題的時期。網刊的發展也不例外。

網刊在探索之初，還沒有發展到“互聯網+”的時代，因此，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互聯網+”的到來、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網刊也面臨著發展的瓶頸。這是因為，網刊的思維模式還停留在紙質刊的模式。也即，我們沒有跳出編輯的視角，去體察讀者的需要。紙質刊在內容為主導下，編輯的思維能夠得以體現。但是“互聯網+”時代不同，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傳播信息的方式以及閱讀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學術生產和學術傳播方式更是發生了從前我們沒有預料的變化，此時，如果我們還固守陳規，不轉換學術期刊的主體意識，那麼必然會把自己引入死胡同。“互聯網+”時代，對期刊的衝擊是致命的，傳統的期刊在網絡環境下被徹底解構。另一方面，網刊的探索是處於學術生產的底層的學術期刊自發的行為，這種自發的行為因為不具有學術評價的功能，也即沒有利益訴求，這在當代中國要想存在，其生命力自然不會越來越強。

但不管怎樣，“‘網刊’畢竟是對高校學術期刊專業化轉型和集約化、數字化發展道路的主動探索，是應對體制困厄而自發進行的‘底層設計’”。^⑩不管其成功與否，都在中國高校綜合性學報改革歷程中留下了歷史印記。

在專業網刊歷經了五年的發展之後的 2016 年，為了應對體制困境而自發進行改革的高校學報，在總結網刊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了專域出版的全新探索。其以 2016 年 4 月 15～18 日在重慶大學召開的“學術期刊專欄出版暨學術平台建設研討會”為標誌，以超星移動數字出版平台為依託，構建了一個新型的“專域學術在線出版平台”，即“超雲”平台。開啟了專業化轉型探索的新模式。

五、倒逼改革：新媒體的衝擊不破不立

一本期刊，無論大小，無論是名刊，還是說淹沒在眾多的學術期刊中找不到的小刊，在當今體制下，都有存在的理由。這正如朱劍老師所言，其實，綜合性期刊發展到現在，還能紅紅火火，我們是沾了體制的光，也就是說現有的體制不管我們如何詬病，其實它還是保護了現有的學術期刊的存在。所謂一切存在都能在當時代社會找到存在的根源和理由，即是如此。但是，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迅速崛起並漸成傳播主流，所有的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學術期刊被推向了學術傳播體系的邊緣，換句話說，體制賦予的學術期刊的中心地位已不復存在，傳統學術期刊的生存空間受到了嚴重威脅，如果不積極採取應對措施，其必將成為明日黃花。“隨著新的傳播渠道的開闢，依靠期刊體制建立和維護的以紙本學術期刊為基點的學術傳播秩序遭遇了最為嚴峻的挑戰，學術傳播的失序已不可避免。”^⑪面對新形勢，我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同進共退，共同面對發展問題。“下一步怎麼辦？還是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高校學術期刊改革，因為不改革沒有出路”，“今後期刊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不是一夜之間將幾千家學術期刊都‘消滅’，這樣做不可能。沒有現存的傳統的編輯部體系，新媒體平台

根本建不起來。沒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數字化平台就只能是空中樓閣。融合發展的概念就是既保留傳統媒體同時又發展新興媒體”，教育部社科司出版管理處處長田敬誠在重慶大學的“學術期刊專欄出版暨學術平台建設研討會”上如是說。

進入 21 世紀，伴隨科技迅猛發展而來的新媒體，其因搭載了數字傳播技術，使得信息傳播速度加快、信息傳播方式改變、傳播信息途徑得以擴展。相較於傳統媒體傳播方式的單一，新媒體以光纖電纜、移動互聯網、大型數據庫、衛星通訊系統等為技術支持，包括一切以數字形式存在的傳播媒體。相較於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當新媒體融入我們的生活，其帶來的變化深入到各個領域，並且是革命性的變化，致使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迅速被解構。

這種變革，同樣衝擊了學術期刊的生存發展。新媒體的衝擊倒逼學術期刊必須面對新形勢，進行徹底的變革。中國高校社科學報從開始便承載了太多的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理想與訴求，並能延續幾十年發展不變。這在中國改革大潮面前是逆流而行的，也是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存在。對此無論是處於制度頂層設計的相關行政管理部門，還是處於制度底層的高校社科學報本身，都看到了問題之所在。如前文所述，他們各自開展了相關改革的嘗試。頂層設計以出台的各種文件為基礎，底層設計以出版改革實踐為依託，無論是哪一種設計，如果拋開時代的發展訴求，都將會是失敗的設計。正因為如此，處於頂層設計的“市場化”與“轉企改制”因其不符合學術期刊發展規律而被擱淺。作為轉企改制的補充性規定，《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同樣因為“沒有對學術期刊另眼看待”，沒有區分學術期刊與非學術類報刊的不同而束之高閣。

2014 年《關於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的出台，明確“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2015 年 2 月，教育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見》在鼓勵高校綜合性學報向專業性學術期刊轉型的同時，提出了媒體融合的改革思路。2015 年 3 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財政部聯合發佈了《關於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其就出版業改革規定了六個方面的重要任務，其中與期刊關係最密切的主要是“創新內容生產和服務”“加強重點平台建設”這兩個方面。^②這一指導意見將期刊改革上升到國家媒體戰略的高度，全方位、全流程對出版進行改革，並指出要建設國家級平台，足見其改革的決心和力度。總之，新媒體融合時代，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倒逼高校社科學報改革勢在必行，無論是頂層設計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還是底層自掘墳墓式的探索嘗試，都是新形勢下對學術傳播新秩序的建構。

① 《教育部關於進一步發展繁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若干意見》（教社政〔2003〕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s78/A13/sks_left/moe_2557/s3103/201006/t20100608_88958.html

② 《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實施方案》（教社政〔2003〕1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9/moe_40/tnull_151.html

③ 《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印發〈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

學名刊工程首批入選學報建設座談會會議紀要〉的通知》（教社政廳〔2004〕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edu.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1/moe_4/tnull_5343.html

④ 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⑤ 參見《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站，<http://www.nps.gov.cn/>

www.gapp.gov.cn/news/1663/103393.shtml

⑥具體參見《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新廣出發〔2014〕4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站，<http://www.gapp.gov.cn/news/1663/199178.shtml>

⑦《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新廣出發〔2014〕4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站，<http://www.gapp.gov.cn/news/1663/199178.shtml>

⑧數據來源於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站，<http://www.sapprft.gov.cn/>

⑨《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教社政〔2002〕10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8/moe_28/tnull_495.html

⑩葉娟麗：《中國大學學報：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⑪王文軍：《分學科評價：綜合性學術期刊評價的合理路徑——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綜合性學報為例》，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⑫仲偉民、桑海：《如何客觀評價CSSCI》，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3期。

⑬⑭沈固朝：《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CSSCI》，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3期。

⑮具體詳見表貴仁：《新世紀新階段高校社科學報的形勢和任務——在全國高校社科學報工作研討會上的講話》，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⑯《新聞出版總署：高校學術期刊要集約化規模化發展》，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news/edu/2009-12/23/content_19117714.htm

⑰相關的觀點參見2010~2012年間朱劍和仲偉民撰寫的學術文章。

⑱共同發起的17家入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的高校社科學報為：《復旦學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蘭州大學學報》、《南開學報》、《南京大學學報》、《南京師大學報》、《清華大學學報》、《求是學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思想戰線》、《四川大學學報》、《文史哲》、《武漢大學學報》、《廈門大學學報》、《浙江大學學報》。隨著《中山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期刊陸續加入，目前聯合編輯部成員刊已增至百餘家。

⑲⑳游濱、彭建國、傅旭東等：《學術期刊專欄出版暨學術平台建設——研討會會議實錄》，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㉑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2016年第2期。

㉒具體參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財政部：《關於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新廣發〔2005〕3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站，<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48321.shtml>

作者簡介：李宏弢，黑龍江大學《求是學刊》副主編、研究員，博士。哈爾濱 150080

[責任編輯 劉澤生]